

第一轮修改

审稿人给作者的意见：

该研究围绕王阳明心学，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当代青年的良知人格。这一探索符合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于本文作出的积极评价。以下将对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进行逐一回复：

意见 1：文中两处引用“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和“做得功夫的，方识本体”中，“功夫”与“工夫”的使用是否遵循了原著？此外，请阐明“工夫”和“本体”的概念。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关于引用中“工夫”与“功夫”的使用问题，由于朱汉民和汪俐（2019）指出，“工夫”同“功夫”，所以在本文中并未有意识地将两者进行统一。现遵从专家的建议，本文统一使用“工夫”，已经将“功夫”修改为“工夫”。此外，在第三页已添加“本体”与“工夫”的阐释。具体如下：

“本体指普遍必然的理性原则，是先天的（杨国荣，2000）；工夫指的是人在通往圣贤之路上所要付出的努力，这其中既包括努力的过程，也包括努力时应该使用的各种途径与方法（朱汉民，汪俐，2019）。”

参考文献：

杨国荣. (2000). 本体与工夫:从王阳明到黄宗羲. *浙江学刊*, (5), 11-17.

朱汉民, 汪俐. (2019). 从工夫到工夫论.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 (4), 12-17.

意见 2：“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这几条是否足以能说明“知”和“行”是同一事物？并且将道德实践归于“知”是否合适？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作者对这部分的内容确实阐述的不够清晰，通过查阅文献，并结合专家的意见，论文修改版中已将“知”修改为了“行”，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关于知行是否是同一事物的问题。除了文中给出有关知行之间关系的几条表述，还有其他较多的表述可以反映王阳明所说的“知己自有行在”，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等表述。此外，研究者们也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核心在“行”（方志远, 2019），所以这里我们将知改为行更为合适。

第二，在阳明心学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主要由哲学学科的学者主导，他们对“知”字兼具良知与良能的内涵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读者来说，由于缺乏对阳明心学的系统了解，很容易对“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这类表述产生困惑。实际上，我们在最初借鉴哲学学者的表达时，仅用“知”来涵盖“行”，这种做法并不妥当。《王阳明全集》中的“知孝知弟”即为“能孝能弟”（陈立胜, 2018），并强调“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基于此，为了便于其他学科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决定将“知”修改为“行”，以更清晰地表达其内涵，也便于讨论部分的对比。

意见 3：该研究旨在探究当代青年的良知人格，但被试似乎均为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这是否能代表“当代青年”？

回应 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您指出的被试群体局限性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经过认真反思，我们完全同意用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来代表整个“当代青年”群体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当代青年的年龄范围、生活经历、社会角色等都更为广泛和复杂，仅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难以全面涵盖当代青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在后续的研究表述中会更加严谨，将研究对象明确为“当代大学生”，以避免对研究结果的过度推断和误解。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4：研究 1 通过原著分析了王阳明的良知内涵，为良知人格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研究 2 中，采用词汇联想的方式生成“良知”的相关词汇，研究 1 的结果并未得到有效运用，这可能存在问题。最终得到的良知人格的结构似乎与

阳明心学无关，并不符合“阳明心学视域下良知人格的内涵与结构”这一题目。

回应 4: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提出的极具价值的建议。您指出的研究 1 与研究 2 之间在内容衔接上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与题目不完全契合的情况，确实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改进的关键点。

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引言部分对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与当代人们所理解的良知之间关系的阐述不够清晰，导致研究 1 与研究 2 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够紧密，进而影响了整个研究的连贯性。此外，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 1 的理论成果在研究 2 中的应用不够充分，使得最终的良知人格结构与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有所偏离，与题目“阳明心学视域下良知人格的内涵与结构”存在一定差距。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论文进行了以下修改和完善：一是对论文标题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精准地反映研究的实际内容和重点，避免给读者带来误导；二是在引言部分增加了一段详细的阐述，深入分析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演变和传承，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确保研究 1 与研究 2 之间的过渡更加自然和合理；三是在引言部分的最后一段对文章的研究目的重新进行了撰写。

具体修改如下：

(1) 将题目“阳明心学视域下良知人格的内涵与结构”修改为“良知结构的演变：王阳明与当代大学生的古今对比”；

(2) 在引言部分增加了这段话：“王阳明的良知学说通过本人及其弟子的民间讲学，将儒家伦理转化为“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正如清代学者焦循所言：“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唐东辉, 2022）。明代中后期，受心学影响的文人通过小说创作进一步推动了良知学说的民间传播，使其通过通俗文学深入百姓生活（纪德君, 2024）。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语境中“坚守良知”“唤醒良知”等日常话语，实质上构成了传统心学概念的现代转译（郝希, 王水涣, 2018），既印证着阳明心学的持久生命力，也揭示着儒家伦理通过文化记忆实现了代际传承。”

(3) 在引言最后一段增加了这段话：“本研究基于当代社会“良知”话语与阳明心学的内在传承关系，通过整合历史文献分析与现代实证研究方法，系统考察良知观的历时性演变及其现代转化机制。研究首先通过对《王阳明全集》的文本分析，系统梳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核心论述，以确立传统良知观的内涵与结构。这是因为王阳明在明朝社会动荡时期提出的良知学说，蕴含着特定的时代诉求；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必然引发良知认知模式的代际差异。然后采用人格词汇法这一经典研究范式（田一等, 2021），对当代民众的良知认知进行实证探索。”

参考文献：

郝希, 王水涣. (2018). 弘扬“致良知”学说需补偏救弊. 人民论坛, (13), 140-141.

纪德君. (2024 年 1 月 29 日). 阳明心学在明清小说中的传承说略. 光明日报, 13 版.

唐东辉. (2022). 从“致良知”到“良知致”——论泰州学派对王阳明良知学的日用实践. 孔子研究, (6), 125-137+160.

田一, 王莉, 许燕, 焦丽颖. (2021).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心理学报, 53(9), 1003-1017.

意见 5：理论模型存在偏差。研究 1 通过原著分析得出良知本体涵盖知、情、意三个层面的内容，但研究 2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却得出五因素结构，包含知、情、意及行和工夫。文章结尾仅对两种结构作了比较，但未分析原因。最终的人格结构可能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支撑。

回应 5：衷心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这对我们完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过重新审视，我们发现由于在研究 1 中对王阳明良知内涵的总结表述不够全面与清晰，致使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偏差。实际上，王阳明的良知理论包含本体和工夫两个层面，其中良知本体又具有行、情、意三个面向，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良知理应涵盖情、意、行以及工夫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针对研究 2 中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五因素结构，我们确实应该深入探究

与研究 1 结果之间的差异原因。在原文结尾，虽然对两种结构进行了比较，但缺乏对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的剖析，这是本研究的疏漏之处。为修正这一不足，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对两者差异原因的详细分析，旨在从理论层面厘清研究 1 与研究 2 之间的逻辑关联，进一步夯实良知人格结构的理论支撑，使其能够更加系统、整体地与王阳明的良知理论相契合，从而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具体修改如下：

（1）P10---重新对《王阳明全集》中的良知进行了表述，“良知涵盖本体与工夫两个核心维度。在本体层面，良知呈现出“行、情、意”三个不同的面向，即表现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以及“立志为圣”的向善之志。这里，本研究将良知界定为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行为准则，其虽先天具足于人性之中，但需要通过后天工夫方能实现由潜在到显在的转化。”

（2）P10---当代大学生与王阳明在良知结构的认识上的最大差异在于良知之知维度上，我们对其进行了原因剖析，“当代大学生对良知的理解生成了一个新的维度，即“良知之知”，并强调“闻见之知”是良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维度不仅揭示了学校德育的时代必要性，更从学理层面回应了国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然而，王阳明则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意为良知能为人提供先天的道德准则，外在客观知识的获得并没有那么重要（郭振香, 2024）。这是因为王阳明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试图以此扭转明代中期官场及社会中空谈学术、忽视实践的不良风气（方志远, 2019）。这种强调道德实践优先性的主张虽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其否定了学习和认知的能力对于良知的重要作用（杨泽波, 2022），也忽视了客观知识在道德良知中的作用（郭振香, 2024），这是不可取的。”

P11---此外，在良知之意维度上，关于“立圣人之志”的问题也进行了原因分析，“但是王阳明的“立志”中特别强调立圣人之志的重要性，但是当代大学生很少有人提及立圣人之志，可能的原因是现代社会以大众文化为主导，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大学生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和现实

目标，而非长远的道德理想（张志伟, 2007）。”

（3）P12---此外，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对于良知五个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知”作为理性认知基础，以“明镜照物”的隐喻展现善恶分辨能力，但存在被私欲遮蔽的可能；“情”通过“见孺子入井”的恻隐之心形成情感驱动，确证道德实践的真实性；“意”则作为中介机制将二者整合为具体实践意向（卢盈华, 2023）。“情-意”联动构成实践内驱力，推动“知善”向“行善”的转化（杨国荣, Hou Jian, 2022）。“工夫”贯穿全程，通过格物、省察等方法破除私欲，保障“知-情-意-行”的贯通，最终达成“知行合一”的修养目标。这五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了从认知到情感，再到意向、实践，最后通过工夫不断深化的完整闭环。”

参考文献：

方志远. (2019). “知行合一”的阳明解读.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 (2), 67-73.

郭振香. (2024). 知识论对良知学的补充——以方以智“知”论为中心. *孔子研究*, (4), 17-29+157.

卢盈华. (2023).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浙江社会科学*, (9), 128-135+160-161.

杨国荣, Hou Jian. (2022). 中国哲学中的王阳明心学. *孔学堂*, 9(2), 4-13+107-121.

杨泽波. (2022). 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哲学研究*, (3), 44-51.

张志伟. (2007). “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8-14.

第二轮修改

审稿人一 给作者的意见：

文章探讨的问题很有意义，作者用两个研究分别解读了阳明心学和当代大学生对良知的理解内涵，并对其做了比较。研究的工作量比较大，不论是收集与分析文本资料，还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构建良知结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修改后的文章对审稿人提出的意见也做了细致的回应。论文基本上达到了发表的水平。

非常感谢专家对本论文的细致评审与宝贵意见！您与研究意义的肯定以及对研究工作量的认可，是对我们团队莫大的鼓励。我们特别注意到您指出论文“对审稿意见做了细致回应”并已达到发表水平，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心。专家的严谨审阅与建设性意见，不仅帮助提升了本文的学术质量，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改进方向。我们将严格遵循意见进一步完善论文，力求在学术严谨性与创新性上达到更高标准。再次对您专业、高效的评审工作致以诚挚谢意！期待未来能继续得到您的指导。

以下将对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进行逐一回复：

意见 1：对良知的理解需要进一步简化，良知学说是孟子最早提出的，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这一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作者在文章中只说到了王阳明对此的看法，并未说明良知是什么。希望作者能够注意这些表达。

回应 1：非常感谢专家细致而专业的审阅意见！您指出的两点意见非常中肯，对于提升文章的准确性和清晰度至关重要。我们已根据您的宝贵建议，对原文进行了如下修改：

第一，我们完全采纳了专家的建议，已将原文中对孟子与王阳明思想传承关系的表述，修改为更精炼、更清晰的版本。第二，我们已在文中明确补充了王阳明对“良知”是什么的内容。

P1---具体修改内容：将“良知”一词源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孟子将良知定义为一种

“不虑而知”的内在直觉。王阳明针对时弊提出良知学说，以期能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拯救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孟子的良知概念到了王阳明那里发生了转变，王阳明对其进行了创造和拓展发展出一套良知心学理论（吴震，2021）。”修改为“孟子最早提出“良知”概念。他认为人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本性的萌芽（《孟子·告子上》），并将“不虑而知”的道德直觉能力定义为良知（《孟子·尽心上》）。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构建了系统的良知心学理论（吴震，2021）。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是天理，亦是心之本体，更是明辨是非善恶之心。”

再次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这些修改显著提升了文章关键概念表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我们已对相关段落及其上下文进行了仔细校对，确保逻辑连贯。

意见 2：文章中两个研究如何衔接需要进一步考虑，第一个研究是文献分析得来的，第二个是因子分析得来的，要对两个作比较需要找到共同的东西。

回应 2：衷心感谢您对方法论衔接问题的深刻洞见！我们完全认同两个研究的比较需建立在共同基础上。本研究的核心比较逻辑在于：良知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伦理概念，其能指（符号）具有历史连续性，而所指（内涵）存在历时性演变。这一辩证关系为文献分析与因子分析的比较提供了学理基础，具体呈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 比较的理论锚点：文化基因的连续性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论——历史文本分析还是现代实证测量——研究的核心始终是同一个跨越 500 多年的概念：“良知”。在王阳明时代，文献分析探讨的“良知”被视为“心即理”的道德本体（《传习录》）；进入新时代，因子分析所测量的“良知”则指向现代人内在的道德认知结构。尽管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探究方法因时代而异，但古今学者所聚焦的“良知”这一词汇及其核心所指是共通的。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本质上都是对同一个永恒命题的不同进路的回应：人究竟如何确立道德判断与实践依据。

(2) 本研究的比较逻辑植根于预设的“古今对话”框架：

第一，解读古代经典：我们将深入分析王阳明的原著，力求排除后世和现代视角的干扰，准确提炼出“良知”这一概念在诞生时的核心内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寻找中国伦理文化的“原始基因”(X)；

第二，调查现代观念：我们将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收集并分析当代人的相关数据，以揭示这些古代的伦理“基因”，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思维中，具体被理解成了什么样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Y)；

第三，进行古今对比：最后，我们将系统性地追溯从“古代内涵(X)”到“现代形态(Y)”的完整演变路径。通过这种对比，最终回答核心问题：在今天我们对于“良知”的理解中，是否依然保留着王阳明心学最根本的精神特质？

在引言部分，本研究已作出明确说明：当下语境中所使用的“良知”概念，正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之“良知”在当代学术脉络中的延续与展开。见 P1 “王阳明及其弟子通过广泛的民间讲学，将良知学说直接转化为“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正如清代学者焦循所评价的：“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唐东辉，2022）。这种实践精神在明代中后期得以延续和扩展。受心学影响的文人，通过小说创作等通俗文学形式，将良知理念融入故事，使其超越讲坛，更广泛地深入百姓生活（纪德君，2024）。这一传承脉络延续至当代。“坚守良知”“唤醒良知”等日常话语，实质上是传统心学概念的现代转译（郝希，王水涣，2018）。这些话语的流行，既印证着阳明心学的持久生命力，也揭示着儒家伦理通过文化记忆的活化，实现代际传承与创新性转化。”

关于两个研究衔接的表述：见 P2 “本研究基于当代社会“良知”话语与阳明心学的内在传承关系，旨在系统考察良知观的历时性演变及其现代转化机制，核心聚焦于辨析传统良知结构与当代良知认知结构之间的演变轨迹与潜在稳定性。为此，研究整合历史文献分析与现代实证研究方法，构建了严谨的探索路径。研究首先通过对《王阳明全集》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系统梳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核心论述，以确立其传统良知观的内涵与结构。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王阳明在明朝社会动荡时期提出的良知学说，蕴含着回应时代诉求的思想结晶。与之形成历史对照的是，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必然引发价值观念与认知模式的代际更迭。那么，植根于传统的良知概念，其核心结构在当代语境下发生了何种演变？又保留了哪些稳定的内核？这正是本研究力图揭示的核心问题。”

审稿人二 给作者的意见：

意见 1：本文虽然提出了探究良知结构的古今演变，但研究问题的具体指向不够明确。例如，研究目的是比较古今良知结构的异同，还是探讨当代大学生良知结构的独特性？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理论背景和当代意义的探讨较为浅显，缺乏对相关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深入整合。

回应 1：非常感谢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指正切中要害，对我们厘清思路、深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针对您提出的两点意见，我们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讨论，现答复如下：

(1) 关于“研究问题的具体指向不够明确”：非常感谢您指出这一点。我们完全认同，研究问题的清晰界定是研究的基石。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正如您敏锐指出的，是探究良知结构的“古今演变”。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良知作为一种道德认知和判断能力，其内在构成要素（即“结构”）在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从王阳明心学到当代）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核心要素是否具有稳定性？变化的重点在哪里（构成要素本身）？本研究并非旨在探讨当代大学生良知结构的“独特性”或“特异性”。我们预设良知的核心心理结构具有人类普遍性。

选择当代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非旨在论证其良知结构的“独特性”。我们的基本理论预设是：**良知的内在结构（核心要素构成）在人类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选择大学生群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①操作性考量：大学生群体相对集中、同质性较高（年龄、教育背景），便于进行规范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和访谈，利于数据收集和分析。

②时代性窗口：大学生是思想活跃、价值观正在成型、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群体，是观察当代良知结构及其外在表现行为的“时代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窗口”，聚焦探讨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那个潜在的、具有古今延续性的“良知结构”是如何被激活、运作并外显为具体行为的。换言之，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当代样本验证和描述那个可能存在的普遍结构在当下的运作形态，并以此为基础与古代（王阳明）理论进行结构层面的比较（异同），从而揭示“演变”的实质——是结构要素变了？还是要素间关系或激活机制变了？抑或是外在表现因社会规范变化而不同了？

我们将在论文修改中，在引言部分更清晰地界定和阐述上述核心研究问题（古今良知结构的演变与稳定性），并明确说明选择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在于获取当代语境下观察普遍结构的“样本”，而非证明其结构的独特性。具体修改如下：

“本研究基于当代社会“良知”话语与阳明心学的内在传承关系，旨在系统考察良知观的历时性演变及其现代转化机制，核心聚焦于辨析传统良知结构与当代良知认知结构之间的演变轨迹与潜在稳定性。为此，研究整合历史文献分析与现代实证研究方法，构建了严谨的探索路径。研究首先通过对《王阳明全集》进行深入文本分析，系统梳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核心论述，以确立其传统良知观的内涵与结构。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王阳明在明朝社会动荡时期提出的良知学说，蕴含着回应时代诉求的思想结晶。与之形成历史对照的是，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必然引发价值观念与认知模式的代际更迭。那么，植根于传统的良知概念，其核心结构在当代语境下发生了何种演变？又保留了哪些稳定的内核？这正是本研究力图揭示的核心问题。

为了科学地捕捉并分析当代民众对良知的认知结构，研究继而采用人格词汇法这一经典研究范式（田一等, 2021）。该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于“所有的人格特质都会被编码到自然语言中去”（Allport & Odbert, 1936），并已被成功应用于探索如中国人社会善念的结构（田一等, 2021）、善恶人格的结构与内涵（焦丽颖等, 2019）等本土化心理构念。本研究选择当代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目的在于将其视为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观察良知普遍认知结构的一个关键“样本”。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广泛接受现代教育并深度参与社会生活，其认知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时代特征。”

（2）关于“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理论背景和当代意义的探讨较为浅显，缺乏对相关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深入整合”：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的这一问题，我们完全认同其重要性，并将在论文修改中认真采纳和落实您的建议。

我们理解您的核心关切是希望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跨学科对话能力。虽然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实证方法直接对比古今良知结构，而非对王阳明思想进行哲学史溯源，但我们完全同意，对研究发现——特别是古今结构之间的契合点与差异点——的阐释，需要更深入地结合相关哲学与心理学理论，以揭示其深层含义与当代价值。因此，我们将在修改稿中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与整合，以回应您的意见：强化哲

学与心理学理论在“差异解释”中的深度整合。主要修改增加了以下内容：

P11（良知之知）---“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审视，该主张虽具历史进步性，却存在双重局限：第一，否定了学习和认知的能力对于良知的塑造作用（杨泽波, 2022），忽视社会观察、文化习得等替代性学习机制；第二，消解客观知识对道德判断的校准功能（郭振香, 2024），悖离现代道德认知理论中“理性-情感”双加工模型（Greene, 2007）。”

P11（良知之行）---“根据共情-利他假说（Batson et al., 2015），良知之行本质上是共情唤醒的道德情感转化为利他行为的直接体现，其行为驱动力超越工具性算计而根植于对他人境遇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郭振香. (2024). 知识论对良知学的补充——以方以智“知”论为中心. *孔子研究*, (4), 17-29+157.

杨泽波. (2022). 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哲学研究*, (3), 44-51.

Batson, C. D., Lishner, D. A., & Stocks, E. L. (2015). *The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In D. A. Schroeder & W. G. Grazian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osocial behavior* (pp. 259-2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e J. D. (2007). Why are VMPFC patients more utilitarian? A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explai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8), 322-324.

意见 2：研究 2 的样本全部为大学生群体，且年龄集中在 18-22 岁，缺乏社会多样性（如不同职业、年龄段的成年人），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无法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词汇联想法虽然能捕捉被试对“良知”的直观联想，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良知的复杂内涵。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的具体操作步骤（如因子旋转方法、模型拟合标准的选择）未充分说明，读者难以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回应 2：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1）关于样本群体多样性。我们完全认同您指出的研究 2 样本多样性不足的问题（样本集中于 18-22 岁的大学生群体）。这一局限确实存在，可能会限制研究结果在更广泛人群（如不同职业、年龄段的成年人）中的直接推广性。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验证良知的心理结构。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如职业、年龄段）在良知的外在行为表现或高频词汇描述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大学生群体提及的典型良知行为可能与

职场人士或年长者不同), 但我们认为, 良知是天理, 是一切道德认识与判断的终极性标准, 也是行为的终极性根据 (沈顺福, 曾焱, 2021), 其内在的核心结构 (涉及知、情、意、行等核心维度) 在人类群体中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稳定性。这种结构上的共性是人类社会共享道德基础的重要体现。因此, 虽然样本来自特定群体, 但对这个群体内部良知结构的深入探索, 仍能有效揭示良知潜在的核心构成要素,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

总之, 我们承认研究 2 样本的局限性会影响其结果的广泛推广性, 但我们认为, 这并不妨碍研究 2 在探索良知内在核心结构这一基本问题上的价值。大学生群体的数据为理解良知的潜在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未来通过纳入更多样化的样本, 我们将致力于验证和完善这一结构模型, 以期获得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 深化对人类良知本质的理解。

(2) 关于 EFA 与 CFA 操作步骤的补充说明。衷心感谢您对研究方法严谨性的细致审阅! 您指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操作步骤未充分说明”的意见完全合理。我们将在修改稿中补充关键细节以提升结果的可信度与可重复性, 具体说明如下: ①关于 EFA 旋转方法, 原文中已提及使用最优斜交转轴法 (Promax Rotation), 采用最优斜交旋转, 因理论预期良知各维度存在相关性 (如情与意的关联), 且斜交旋转能更准确反映潜在因子的实际结构。②在数据分析部分完整呈现 CFA 模型拟合标准。

“一般来说, 用于评价模型拟合优劣的统计指标有: 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校正指数非规范拟合指数 (Tucker-Lewis Index, TL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SRMR) 和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当 CFI 和 TLI 大于 0.90, SRMR 和 RMSEA 小于 0.08 时, 即认为模型的拟合是可以接受的 (Hu & Bentler, 1999; McDonald & Ho, 2002)。”

参考文献:

-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
- McDonald, R. P., & Ho, M. H. (200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repor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1), 64-82.

意见 3: 虽然提出了古今良知结构的异同,但对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如现代化、价值观变迁)缺乏深入分析。将“良知之知”视为当代大学生独有的维度,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已隐含“知”的重要性。讨论部分提到良知研究对“文化自信”“道德建设”的意义,但缺乏具体的实证依据或政策建议。

回应 3: 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1) 关于古今良知结构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我们完全认同专家指出的关键不足:在讨论古今良知结构差异时,未能充分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动因(如现代化进程、核心价值观变迁等)。这一批评切中要害,点明了提升本研究历史文化深度和理论解释力的重要方向。专家的意见对我们完善论文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针对这一意见,我们将在修订稿的“讨论”部分进行以下重点修改和深化。例如:

①在良知之情中,结果发现,当代大学生较少强调或体验到践行良知后所带来的心理满足与快乐,我们从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对这个情感体验的外在表现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P11----“王阳明不仅提及“恻隐”和“不安”,而且还强调“致良知以求自谦”,认为依良知行事可带来内心满足,并指出“良知即是乐之本体”,突出自足、快乐等积极情感。而当代大学生更多将良知之情与廉耻、内疚等消极情感相联系,较少体验到行善后的愉悦或满足。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社会转型期中人际信任缺失与道德环境复杂化,个体更担忧善行可能遭遇恶意回应或缺乏保障(刘国云, 2012; 赵丽涛, 2015),从而更关注道德行为的代价,而非情感回报,导致其良知之情的体验偏向消极。”

②在良知之意中,我们从价值观上对当今大学生没有立圣人之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王阳明的“立志”中特别强调“立圣人之志”的重要性,然而当代大学生鲜少将“立圣人之志”作为人生目标,这一价值转向的深层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以大众文化为主导,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盛行,加之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促使大学生更侧重追求短期利益和现实目标,而非长远的道德理想(张志伟, 2007)。”

(2) 关于将“良知之知”视为当代大学生独有的维度。非常感谢专家对“良知之知”维度的关注与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充分理解专家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已蕴含“知”的重要性的观点。然而,经过深入研读王阳明原著及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聚焦大学生良知内涵)的具体发现,我们认为本研究提出的“良知之知”维度,其内涵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的“知”存在本质区别,因此确实是本研究在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新识别出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一个维度。理由如下：

①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知”的特定内涵与本研究“良知之知”的差异：

- ✓ 王阳明原典的界定：《传习录·徐爱录》核心论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行，已自有知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清晰表明的，阳明先生所言的“知”，绝非独立于“行”之外、作为客观知识储备的“知”。其核心特征是：**第一**，与“行”不可分割的一体性：“知”是行动的内在发端（主意、始）、驱动力和构成部分（“行中自有知在”）。真正的“知”（真知）必然蕴含并导向“行”，反之亦然。**第二**，其本质是“良知”与“意念”：如王剑（2016）、陈立胜（2019）等学者所强调，此处的“知”主要指内在的道德意识、当下呈现的良知判断和行动意念。陈立胜更明确将其等同于“意”，视其为行动发动到完成过程中与“行”一体两面的内在维度。**第三**，“行”是其验证与完成：方志远（2019）的解读（“知与不知，全在于行与不行”）精准地抓住了阳明思想的精髓——脱离“行”的“知”是虚妄的（“未知”），只有通过“行”才能验证和完成“知”的真实性（“知之成”）。
- ✓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理解的“良知之知”，特指引导个体判断是非对错以及规范个体外在行为的客观知识。这包括：系统性的道德规范与伦理知识，关于社会规则、法律法规的认知，作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依据的、相对客观化、体系化的知识储备等。
- ✓ 核心差异之处：阳明之“知”是行的内在驱动与构成要素；本研究之“知”是行的外在指导原则与判断依据。

②现代学者解读印证了王阳明“知”的非知识论特征：

杨国荣（1997）指出的“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恰恰反映了阳明“知”与“行”的互渗互融，消解了客观知识作为独立环节存在的空间。

丁为祥（2019）的批评（“知行合一”说导致对认知的排除与屏蔽）虽是一家之言，但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阳明学说中系统性的、作为独立推动力量的客观知识维度是缺失或被边缘化的。他认为这屏蔽了“来自认知的推动力量”，正说明王阳明所依赖的动力源于内在良知（意念）而非本研究强调的客观知识体系。

③“知行合一”的核心在“行”而非独立的“知识”重要性：

综合王阳明原意及方志远（2019）等学者的解读，“知行合一”的核心落脚点和终

极检验标准在于“行”。其理论旨归是强调道德实践（行）的根本性、统摄性和验证性。虽然“知”（作为意念/良知）是行不可或缺的内在起点，但王阳明从未赋予独立于实践之外的、作为客观知识储备的“知”以独立的、基础性的、需要被特别强调和积累的重要性。他强调的是“真知”在“行”中的呈现与完成。

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蕴含的“知”，其独特内涵（作为内在良知、意念，与行一体两面）及其在理论中的位置（从属于并服务于“行”的核心地位），均显著区别于本研究所发现的、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凸显的“良知之知”维度（作为引导判断和规范行为的客观知识体系）。

正是由于这种内涵与功能上的本质差异，以及王阳明原典和主流解读中并未将这种客观知识体系作为其良知学说或知行观中一个独立且被强调的维度来对待，我们坚持认为，“良知之知”作为本研究得出的五个维度之一，是基于当代大学生实证数据新识别出的、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维度，它丰富了我们对于良知内涵在当代语境下发展的理解，而非对王阳明已有思想的简单重复。它体现了在复杂现代社会中，系统的道德知识学习与储备对于良知培养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阳明心学在当代应用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发展。

（3）关于讨论中“文化自信”与“道德建设”意义阐述。没有具体的实证证据或政策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正如专家所洞察，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与核心内容，是探索和揭示“良知”结构从古至今的演变脉络与内在稳定性。这是一个基础性、探索性的研究工作，旨在厘清关键概念的结构及其历史发展。因此，深入探讨“文化自信”和“道德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政策设计或提供直接的实证支撑，并非本研究的首要任务，也超出了当前研究的既定范围和深度。同时，考虑到学术论文的篇幅限制，若要在保持研究主线清晰和论证深度的前提下，对“文化自信”和“道德建设”这一宏大命题展开充分且具体的实证和政策层面的论述，确实存在困难，容易导致论述分散或流于表面。**第二**，我们在讨论中提及这些意义，其核心意图并非立即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旨在点明这项基础性研究的潜在长远价值和应用方向。本研究对“良知”结构的系统探索与界定，恰恰是为未来更深入、更具应用导向的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刘国云. (2012). 道德祛魅:伦理学维度下的人际冷漠问题. 思想战线, 38(1), 52-56.

赵丽涛. (2015). 我国深度转型中的社会信任困境及其出路.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1), 63-68.

张志伟. (2007). “断裂”与“兼容”: 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8-14.

意见 4: 部分语句冗长或逻辑不清, 如摘要中“良知涵盖本体与工夫两个核心维度”的表述过于抽象。

回应 4: 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理解并认同专家关于摘要中“良知涵盖本体与工夫两个核心维度”等表述可能过于抽象, 以及部分语句存在冗长或逻辑不清问题的指正。**第一**, 我们对文中所有被指出的以及自查发现的冗长、逻辑不够清晰的语句进行了梳理和改写, 力求表达更加简洁、直接、逻辑顺畅, 提升可读性。**第二**, 我们认识到, “本体”与“工夫”这两个核心概念确实源自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哲学), 对于心理学背景的读者或其他非哲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言, 初次接触时可能不易理解其具体所指。但是我们已在文中对这两个词进行解释, 便于读者理解。

例如, 在修改稿中, 我们对部分表述进行了调整(示例):

P11---原文“陈立胜(2018)认为王阳明提及的知孝知悌、知爱知敬均是能孝能弟、能敬能爱, 其中“知”已兼有良知良能之意。所以, 无论古今, “行”始终是良知内涵极为关键的一个方面。”修改为“陈立胜(2018)进一步阐释, 王阳明所谓“知孝”“知悌”实为“能孝”“能悌”, 其中“知”已蕴含良知与良能的统一。由此可见, 无论历史语境如何变迁, “行”始终是良知不可或缺的实践维度。”

P11---原文“然而, 在具体行为表现上, 古今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例如, 王阳明所强调的“忠君”观念, 是其良知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重要体现,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这是因为“三纲五常”中蕴含的部分道德规范, 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修改为“然而, 良知指导下的具体行为内容具有历史情境性。以王阳明倡导的“忠君”为例, 作为传统社会背景下良知学说的重要体现, 其在现代社会中已失去适用性。究其本质, 是因为“三纲五常”等历史道德规范中的部分要求, 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平等化、民主化诉求相冲突。”

意见 5: 对王阳明原典的引用较多, 但对当代心理学研究(如道德认知、亲社会行为)的引用不足。

回应 5: 非常感谢专家敏锐地指出我们在文献引用平衡性方面存在的不足。我们完全理解并认同专家的意见：论文中对王阳明心学原典的引用相对集中，而对当代心理学领域（特别是道德认知、亲社会行为等相关领域）最新研究的引用确实不够充分。这可能导致论文的理论框架在衔接古典哲学智慧与现代心理学实证研究方面显得不够紧密，也未能充分展现本研究在更广阔心理学学术脉络中的位置。

专家的意见非常中肯且具有建设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并提升论文的学术深度与广度，我们将在“讨论”部分，特别是在探讨良知结构维度的古今差异、普遍性与独特性时，系统性地引入和讨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例如：P11---“该机制已获实证支持，特质积极共情可以提升亲社会行为倾向（岳童等, 2021）；羞愧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郭英等, 2023）。”

参考文献：

郭英, 田鑫, 胡东, 白书琳, 周蜀溪. (2023). 羞愧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三水平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1(03), 371-385.

岳童, 黄希庭, 傅安国, 薛黎明. (2021). 特质积极共情: 一种高利他性的人格品质. *心理科学*, 44(3), 754-760.

审稿人三 给作者的意见：

我仔细阅读了之前审稿专家提出的所有意见及作者的回应。作者对稿件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和完善，论文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值得肯定。然而，还存在一些小问题，希望作者能够进一步思考。

感谢专家对修改稿的肯定以及对本研究价值的认可。对于您提到的仍需改进之处，我们将在后续修改中认真研讨并完善，力求使文章更具严谨性与完整性。再次感谢您的指导与支持！

意见 1：部分语句需要进行精炼。例如，引言第一段的前两句话，可以进行拆分，以提高可读性。后面段落中亦存在相似问题。

回应 1：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已根据您的意见，对文中表达不够精炼的部分进行了逐一修改。例如，在引言第一段中，已将前两句话进行拆分和重组，调整了句式结构，以增强表达清晰度和可读性。同时，我们也对全文其他段落中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了全面检查与修订，力求使语句更简洁、逻辑更明确。

已将原句“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 2015 年两会期间提及，“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曹文泽, 2017）。”修改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2015 年两会期间，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曹文泽, 2017），明确将阳明心学定位为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思想资源。”

意见 2：在前言第三段，提到“在新时代，阳明心学的普及和阐发，对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曹文泽, 2017）。”作者接下来论述了不同学者对良知的内涵与结构的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上述两句之间的逻辑性稍差。二是，作者罗

列了不同学者对良知的内涵与结构，不同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回应 2：感谢专家对稿件的认真审阅及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所指出的前言第三段中逻辑衔接不足以及不同学者观点之间内在逻辑不够清晰的问题，我们非常认同，并已据此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以下是我们针对具体意见所作的调整与回应：

(1) 关于“现实意义”与“良知研究”之间逻辑衔接的处理。我们在两句之间加入了以下过渡性表述：“在这一背景下，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与结构的厘清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到心学理论的当代阐释与实践活力。”

(2) 关于不同学者观点内在逻辑的梳理与呈现。①将观点按“内涵”与“结构”分为两大类，使读者更易把握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②在“内涵”部分，依逻辑顺序呈现从“觉察”“能力”到“动力”乃至“形上实体”的递进与扩展；③在“结构”部分，分别突出系统构成、层次划分与心理要素三个不同分析路径；④最终总结指出，这些多元理解共同体现出良知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也因传统人文范式的局限而难以达成共识，为后文引入心理学与实证研究做好铺垫。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在新时代，阳明心学的普及与深入阐发，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应对当前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曹文泽, 2017）。在这一背景下，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与结构的厘清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到心学理论的当代阐释与实践活力。当前学界主要在哲学与伦理学视域下对良知概念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就良知的内涵而言，不同学者提出了各有侧重的理解：耿宁强调其作为对意念的当下直接觉察（李明辉, 2014）；郁振华（2014）将其界定为一种道德的能力之知；黄勇与崔雅琴（2016）则视良知为具有行动激发力的“动力之知”；沈顺福与曾焱（2021）进一步从形上层面主张良知是超越的实体；杨国荣则指出良知内在地融汇了理性规范，并表现为“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与恒定意志（杨国荣, Hou Jian, 2022）。在良知的结构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系统性理解：吴震（2021）指出，王阳明以良知本体为根基，系统阐发了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良知自觉、良知一念及良知无知等一系列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建构出一套良知学体系；张新民（2017）则从本体、实践、教育、学说四个层面整体把握

阳明良知说；陈立胜（2018）提出“知—情—意”三位一体模型，指出良知同时涵盖“知”（知爱知敬、知孝知弟、知是知非）、“情”（真诚恻怛）与“意”（好善恶恶）。这些研究反映出良知概念内涵的丰富性与结构理解的多元性，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人文范式的局限，难以实现实证检验与操作化测量。尽管已有学者如李承贵（2021）、舒曼（2018）尝试从心理学视角推进良知研究，但仍多停留于理论梳理与阐释阶段，实证探索相对薄弱，亟待跨学科方法的深入引入。”

意见 3：在“表 2 良知本体内涵的内容分析结果”中，由于涉及的具体细目较多，作者仅呈现了部分典型细目。建议附上相关细目。

回应 3：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已认真考虑了您指出的问题。我们完全理解您希望更完整地呈现分析结果的考量。在最初撰写时，我们确实对所有细目进行了完整的编码与分析。出于以下两点考虑，我们在正文中仅选取了部分典型细目进行呈现：第一，部分传统哲学词汇（如“中节之和”）对于非专业领域的读者而言较为陌生，若逐一加以解释，将在正文中占用较多篇幅；第二，我们认为当前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高频细目，已能清晰、准确地支撑和反映良知本体的核心内涵与外在表现，不影响最终结论的归纳。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您的专业判断。为便于您全面审阅我们的分析工作，我们将完整的“表 2 良知本体内涵的内容分析结果（全部细目）”陈列如下。若您认为所有细目对于论文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愿意遵照您的指导，将其作为附录或在正文中以适当形式予以补充，以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透明度。具体修改如下：

表 1 良知本体内涵的内容分析结果

不同面向	具体细目
行(33)	孝（事亲、奉养、从父兄命）、忠、信（守信）、仁、义、知爱知敬、知善知恶、悌、舍生取义、知是知非、父慈、中节之和（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有序、朋友之信）、弃富贵、言而忠信、行而笃敬、断断无他技（忠诚专一）、休休如有容（宽厚容人）、辞让、明德、亲民、廉洁、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情(28)	自谦、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安、恻隐、嫉恶如仇、嫉妒、诋毁、敬畏、羞恶、忸怩、恻怛、自悔、轻傲、好善恶恶、乐、心安、自谦
意(15)	诚、心正、立志、不欺

意见 4: 在研究 1 和研究 2 的内容论述结束后，可以增加一个小结。

回应 4: 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您建议在研究 1 和研究 2 后增加一个小结，以加强论文的逻辑性，我们认为这一意见至关重要，并已认真采纳。根据论文的实际结构与论述逻辑，本研究将小结置于讨论部分开端（即在分点讨论“4.1 古今良知结构的比较”之前），旨在强化论述层次。研究一（理论构建）与研究二（实证验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核心发现在此得以集中梳理，为后续 4.1 至 4.3 的分点讨论提供清晰的逻辑起点，避免与结果部分重复。该小结承上启下，既概括了传统文本分析与现代实证探索的主要结论，又通过指出“古今结构的契合与差异”（尤其“良知之知”维度的凸显），自然引出了“4.1 古今良知结构的比较”。更重要的是，此小结超越了单纯总结，成为后续讨论的“导论”与“论点概要”，预先明确了聚焦古今对话与时代差异的核心方向，从而提升讨论的深度与集中度，凸显研究的学术价值。

我们深信，在当前位置增设这一小结，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您提出建议的初衷——即增强逻辑连贯性与论述深度。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这对我们提升论文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增加内容如下：

P10---“本研究通过研究 1 对《王阳明全集》中“良知”相关章句的系统梳理，从学理上确立了良知“本体”与“工夫”两大核心维度。在本体层面，良知具体呈现为“行、情、意”三个面向，即“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以及“立志为圣”的向善之志。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良知界定为一种先天内在于人性的道德准则，需通过后天工夫才能由潜在状态转化为显在状态。研究 2 采用人格词汇法，通过词汇联想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对当代大学生的良知概念进行实证探索，最终构建出包含五个因素的良知心理结构：良知之知、良知之情、良知之意、良知之行与良知工夫。对比两项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的良知认知与传统阳明学体系在“情”、“意”、“行”及“工夫”方面高度契合；然而，在“良知之知”维度上则存在差异。该维度在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内涵更侧重于道德判断中的认知自觉与理性辨析，反映出良知概念在现代语境下逐渐强化认知化与理性化的发展趋向。上述结果为理解良知内涵的延续与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以下将分别对良知各维度进行详细分析与讨论。”

意见 5：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除了对一阶五因素模型进行检验外，作者是否构建了其他模型作为竞争模型？比如，高阶因素模型或者双因子模型。

回应 5：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您提出的关于补充报告其他竞争模型的建议非常重要。在验证性因素分析过程中，我们确实构建了多个竞争模型，包括一个高阶模型和其他竞争模型。由于正文篇幅所限，我们未将这些模型的详细拟合指标纳入其中，但所有模型比较的结果均一致表明，一阶五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佳，从而为本研究量表的维度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现将这些竞争模型的详细拟合指数结果汇总如下，供您审阅。若您认为必要，我们亦可根据您的建议，将此部分内容作为附录或补充材料予以呈现。再次感谢您的审阅与指导。

结果如下：

模型 1 (M1)：单因素模型，良知的五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是否表明良知有可能是单因素结构，即 24 个项目所测的都是同一个维度，因此有必要进行单因素结构模型与观测数据之间拟合度的检验。

模型 2 (M2)：双因素模型，卢盈华（2023）在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进行重探时指出，对道德情感和道德志向的积极培养可以有力推动道德行为的实现，经过实践行动之后的良知才能深化，道德知识才能更好地得到认识和执行；而行动和外在知识的掌握又会反过来强化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此外，研究也指出，为善去恶的工夫与道德情感一样，可以推动善念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这里将良知之知和良知之行归为一个因素，良知之情、良知之意和良知工夫作为一个推动道德行为的因素，进而对双因素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

模型 3 (M3)：三因素模型，陈立胜（2018）认为良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有知（知孝知弟、知爱知敬、知是知非）、情（真诚恻怛）和意（好善恶恶）三个面向，其中，“知孝知弟”“知爱知敬”之“知”兼有良知良能的意思，即包含了“行”；“知是知非”之“知”是一种独知，强调的是省察、戒慎恐惧的致良知工夫。所以，这里将良知之知、良知之行和良知工夫归为一个因素，良知之情和良知之意分别为一个因素，进而对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

模型 4 (M4)：四因素模型，有学者认为王阳明所提出的良知，作为个体的内在准则，其本身就包含了理性的规范（杨国荣, Hou Jian, 2022），而普遍的社

会道德规范、要求只有内化为个体的情感、信念和意愿，才能推动道德行为的发生，这里意愿与情感为行为的发生与贯彻提供了内在动力。所以这里将良知之情与良知之意合并为一个因素，对四因素结构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

模型 5 (M5)：五因素模型，即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良知之知、良知之情、良知之意、良知之行和良知工夫五因素模型，与其他竞争模型拟合结果进行比较。

模型 6 (M6)：二阶五因素模型，五个一阶因子（良知之知、良知之情、良知之意、良知之行和良知工夫）背后还存在一个共同的、更抽象的“良知”的模型。

良知结构各模型拟合指标的比较表 ($n = 461$)

模型	χ^2	df	χ^2/df	AIC	BIC	CFI	TLI	RMSEA	SRMR
M1	1904.86	251	7.59	20550.70	20852.43	0.71	0.69	0.12	0.08
M2	1647.41	250	6.59	20295.25	20601.12	0.76	0.73	0.11	0.08
M3	1390.81	248	5.61	20042.65	20356.79	0.80	0.78	0.10	0.08
M4	1052.13	245	4.29	19709.97	20036.51	0.86	0.84	0.09	0.07
M5	767.26	241	3.18	19433.10	19776.17	0.91	0.90	0.07	0.05
M6	799.74	246	3.25	19455.58	19777.98	0.90	0.89	0.07	0.06

意见 6：在讨论部分“4.1.2 良知之情”，当代大学生良知之情与王阳明对情的认知是否一致？二者存在何种区别？原因是什么？

回应 6：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关于当代大学生良知之情与王阳明对“情”的认知，我们的分析表明，二者在承认良知具备情感维度这一基本结构上是一致的，但在情感体验的具体表现和侧重点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之情”不仅涉及“恻隐”、“不安”等消极情感，而且也会涉及“乐”与“自谦”（自我满足）等积极情感，强调道德实践带来的内在愉悦和满足感，其情感体验是充盈且自足的。相比之下，当代大学生的良知之情更多地与廉耻、内疚、同情等具有约束和警示意义的道德情感相关联，而对行善后产生的积极心理回报体验较弱，整体情感色调偏于消极。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在修改中对这一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虽然当代大学生与王阳明均承认良知具有“情”的面向，但在情感表现上存在差异。王阳明不仅提及“恻隐”和“不安”，而且还强调“致良知以求自谦”，认为依良知行事可带来内心满足，并指出“良知即是乐之本体”，突出自足、快乐等积极情感。而当代大学生更多将良知之情与廉耻、内疚等消极

情感相联系，较少体验到行善后的愉悦或满足。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社会转型期中人际信任缺失与道德环境复杂化，个体更担忧善行可能遭遇恶意回应或缺乏保障（刘国云, 2012; 赵丽涛, 2015），从而更关注道德行为的代价，而非情感回报，导致其良知之情的体验偏向消极。”

意见 7：作者根据之前审稿人的意见，将论文题目修改为了“良知结构的演变：王阳明与当代大学生的古今对比”。我赞同作者的做法，建议在前言部分，可以稍微详细论述良知结构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当前社会良知的显著特点。此外，作者应该重新解释研究的实践价值，目前似乎与研究主题并不相符。

回应 7：感谢专家的认可与宝贵建议。

（1）关于稍微详细论述良知结构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当前社会良知的显著特点。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您指出的方向非常具有建设性，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修改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关于良知结构在历史中演变的具体细节以及当代社会良知特点的宏观概括，本身涉及非常广泛的哲学史和社会学讨论。这些内容虽然极具价值，但若在前言部分展开，可能会分散论文的核心焦点——即通过实证数据与文本分析，对王阳明与当代大学生这两个具体群体的良知结构进行聚焦对比。

我们非常赞同您关于突出“演变”线索的见解。因此，我们在前言修改中，采取了更为聚焦的策略：首先明确了本研究关注的是“古今之变”中的一个典型截面（即王阳明与当代大学生的对比），而非全景式的哲学史梳理；继而，我们将这一“演变”的具体内涵——即从良知的“知”、“情”、“意”等外在形式的转变——作为本研究核心的分析框架和问题意识贯穿全文，并将在讨论部分结合数据结果对其进行集中阐释。

这样做既确保了前言部分紧扣研究主题，保持简洁性，又能为后文的对比分析留下充分的展开空间。我们相信，这一处理方式更能突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即从结构视角进行实证对比），并使全文逻辑更为紧凑。

再次感谢您的悉心审阅和极具启发性的意见，您的指导让我们对如何更好地呈现研究主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恳请专家继续批评指正。

（2）关于实践价值这部分内容，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对研究中关于实践

价值的部分进行了修改，重点突出了“良知结构”这一核心主题，使实践启示与研究主题更为契合。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首先，在文化认同与教育层面，通过对王阳明良知观进行创新性阐释与转化，能够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提供新的视角，引导大学生在道德情感结构中建立与文化传统的联系，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其次，在道德实践方面，良知内在具备的“知—情—意—行—工夫”动态结构，有助于缓解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而不行”道德困境（李恒川, 王军, 2012），推动道德认知向持续道德行为的转化，为个体自我完善与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心理基础。最后，在心理健康促进领域，良知结构所蕴含的自我觉察和情感调节等功能，可为大学生心理调适和健康人格培养提供本土化资源（舒曼, 2020），也为中国语境下的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提供了实践方向。”